

几个理论问题

首先第一个概念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社会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以及一系列的运行制度，还是要为资本的增值和扩张服务的。无产阶级即使夺取了政权，如果仅仅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人（如“党”）上升为统治阶级，由于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机器未发生质的改变，那么掌握了生产资料的这一部分无产阶级就可能会逐步地把生产资料据为己有，变为进行压迫和剥削的新的资产阶级。即使生产资料真的实现公有，也必须有人来进行管理和操作。如果不改变原有的进行统治的国家机器，如果缺乏无产阶级真正的监督和民主制度，这些管理操作者完全有能力通过原有的国家机器的统治手段将生产资料再次私有化。资产阶级打碎了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与国家机器，建立起了崭新的、现代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真正胜利，就必须打碎原有的国家机器，沉重削弱国家的剥削和镇压的职能，直至原本用于剥削和镇压的国家的最终消亡。因此，列宁总结说：“**无产阶级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组织得已经能立即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当然，国家消亡并不意味着否定管理、否定权威。问题的关键是彻底改变社会的组织结构、社会制度，尤其是要大大削弱国家的剥削和镇压的职能。而巴黎公社，在这方面做出了第一次尝试。列宁将其总结为：“**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变成了一种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这就是打碎国家机器的实质。

但是列宁的论述是否有问题？当然是有的。列宁是要在落后国家进行革命，是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列宁也说了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是为文明创造前提。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被迫要求“客串”中心国家中资本主义所要扮演的角色，之后才能走向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现代的“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列宁的理论，实际上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但是，由于列宁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大大延长了社会主义存在的时间，使其横跨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因此，在革命之初，由于经济发展尚不充分，国家机器并不能被完全打碎，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相反，社会主义为了演好资本主义在中心国家扮演的角色，还不得不借助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的部分特征。因此，就有了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逐步战胜资本主义**”的论断，在政治上也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打碎旧有的国家机器，加强社会主义制度，直至国家权力的逐步削弱。因为这个国家是要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又保留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因此，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必须是社会主义领导着资本主义走，而不是资本主义领导着社会主义走。如果资本主义的因素越来越强，国家机器的权力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持续扩大，那么，社会主义因素就会变成一件华丽的外衣，成为少数掌握了资本的统治者用来控制人民的工具。那么，列宁希望什么可以保证国家机器的不断削弱使这个国家能够真正走向社会主义呢？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中总结了研究成果：“**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但是，如果剥夺了资本家的资产转化为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存在了，全体人民都成了无产阶级，那么还存在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吗？按照一般的对“专政”的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仅仅指的是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以及镇压他们的反抗，那么，它终究是一种短期的，乃至瞬间的行为。如果是这样，只要公有制建立，生产力持续发展就能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的理论也就是如此。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与

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这样理解无产阶级专政或许说得通，但是，在列宁的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如果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剥夺和镇压，是不是大部分时间里，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呢？还是说，彻底粉碎了原来的资本家的反抗，就可以宣布建成共产主义？有人会说还有国外的资产阶级的渗透和颠覆活动，但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独有的举措，相反，是伴随着整个国家的历史的，根本不能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在革命胜利之后剥夺资本家并镇压他们的反抗，仅仅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形式。在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由于旧的国家机器不可能被完全破除，因此几乎是一定会形成新的剥削者和新的剥削阶级。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最有可能变为“新阶级”的自然是现有的生产资料的管理者和操作者，在列宁主义的条件**下也就是党自身**。而这种剥削者在产生时可能是促进社会进步，但是随着其资本的扩张，很可能把使国家偏离社会主义的既定目标，从而阻碍社会进步，阻碍国家机器的革新和国家权力的制约和削弱，相反，为维护自身统治它们可能更需要经过扭曲改造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不断强化的国家机器，将国家引向最坏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方向。因此，必须要通过无产阶级的专政不断的纠正国家的方向使国家的权力尤其是统治和镇压的权力不断削弱。也就是列宁说的**“使技术人员、监工、会计以及所有公职人员所领的薪金不超过工人的工资，使他们受武装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在国家机器进行不能完全打碎的情况下赋予十分有可能重新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无产阶级反抗和斗争的权利。也就是**“人民镇压剥削者……只要有武装群众的组织。”**而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偷换成党或领袖的专政（列宁已经驳斥了这一点），之后再偷换成官僚与新资产阶级专政。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同义词。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在讲到社会主义时，无论其定义如何，他们都始终没有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看作某一部分具体的人，因为这关系到的是国家机器和经济生产关系的运作方式。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所做的主要尝试就是**“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因为阶级属性和阶级立场归根结底是由在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在这个基础上研究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们才能理解无产阶级本质上的民主性。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它的管理者和操作者如果缺乏监督为什么会能够逐渐把权利和资本据为己有从而使公有制蜕化为官有制直至私有制？要进一步解释这种蜕变，必须联系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思索。我们将要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

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由于按劳分配，因此还存在着表面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现象。而这种因素可能会成为资本复活的萌芽。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但它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一般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它就是在按劳分配的制度下存在着的导致分配中名义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权利，它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另外一种理解就复杂一些，它更强调的是“资产阶级”这个范畴。也就是说有人可以将自己的这种导致实际上的不平等的权利转化为资本，从而导致两极分化和私有制的复辟。所以，资产阶级法权不仅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即“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或“走向社会主义”的时期）也有可能产生，而且产生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因素还要比马克思说的两条多得多。如果缺乏有效的无产阶级专政，缺乏普遍的撤换制和监督权，缺乏强大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那么有人就完全可以把这种权利转

化为资本，再通过这种“权力资本”来扩充这种权利，形成循环，那么资产阶级法权是完全可以不断扩展的。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由于人民本身的素质和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偏低，人民不仅没有“**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的意识，甚至没有进行工业劳动的经验和当家做主的意识。因此实际情况就是不得不将公有的生产资料委托给一部分社会精英进行管理。但必须要保证生产资料的公有性质而不能使他们通过扩充资产阶级法权将使用经营权变为所有和支配权。

如卢森堡所说：“**全体人民群众必须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否则社会主义就将是十几个知识分子从办公桌下实行的、钦定的。绝对公开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交换经验就只限于新政府的官员的排他的圈子之内，腐化不可避免。**”但人民素质的普遍低下和生产力水平的整体偏低使全体参加公共生活缺乏可操作性。带来的后果有两点：第一点是人民缺乏对国家机器进行监督（更不用说管理）的经验和能力，更缺乏必要的组织力量。因此，为了经济的发展，不得不赋予那些极少数高素质精英人才以极大的权力和极好的待遇，这里，已经承认了人的“后天特权”。第二点就是刚刚脱离封建制度，愚昧迷信仍然盛行，人民没有当家作主的意识和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觉悟，因此自然导致对指令性计划的习惯性服从，以及组织起来共同监督的意识十分淡薄。这就给了这些技术官僚利用这些资本形成利益集团提供了空间，**这里，资产阶级法权已经由不可抗的自然因素，天然特权层面上升到经济层面。**但是，毕竟短时间内人民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不能有很大提高，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党的内部随着经济发展凭着资产阶级法权自然会产生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再加上他们比真正的无产阶级具有组织和信息的优势，尤其是列宁主义式的政党的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使他们非常容易联合起来要求扩大他们这个利益集团利益——要求制度变革，要求符合他们最大利益的私有化，同时将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专政。如果受到限制，他们中的个体就会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首先来获得这个利益集团中个体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把无产阶级赋予的权力看作是自己的资本，且由于他们不断强化国家机器并掌控了暴力机关，人民已经不可能再行使撤换权和监督权，人民仅有的一些组织形式也可能被打碎，**在这里，资产阶级法权就由经济层面上升到了政治层面。**随之当然就是这些利益集团逐步进入高层，最终实现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在落后国家进行革命，人民不得不把一些权力交由一些掌握知识技术的社会精英来行使，用以“为人民服务”。因此他们就可能以自身的地位，知识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作为资本，又利用这些资本来扩充自己的权利，导致资产阶级法权并不断扩张。并且在这些国家的保留较强力量的国家机器为资产阶级法权的不断增长和扩张提供了机会。如果缺乏对国家机器的制约和控制，缺乏人民的监督，缺乏赋予和收回官僚的权力的能力（也就是选举权和罢免权），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无产阶级的被专政，官僚统治地位的确立，直至完全形成一个完全凌驾于人民头上的特权阶层。

卢森堡曾经警告说：“**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在官僚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如果缺乏对生产关系的及时变革，缺乏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和限制，抛弃或故意扭曲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最终将导致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资产阶级法权不断扩张，吞噬人民创造的大部分社会财富的恶果。

其实，列宁晚年在通过新经济政策恢复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将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思考。毕竟，走向社会主义的历程，实际上就是生产力不断发展，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尤其是官僚权力不断被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民主不断发展的过程。

斯大林在阐释列宁主义时逐步认为只要建立起公有制，并利用计划经济推动生产力发展，就可以自然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因此，斯大林主义要求以不惜代价推动经济增长极大化为目标。同时，斯大林彻底扭曲了“专政”的概念，提出“阶级斗争尖锐论”。即“**我们的进展**

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要采取更尖锐的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在这里，“被击溃了的”这个词就将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阶级斗争集中于具体的人身上，认为阶级斗争完全来源于旧的反对派和资本主义的包围而产生的“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恐怖分子”。因此，阶级斗争尖锐论实质上成为已经逐渐蜕化为作为国家机器官僚机构的“先锋队”的党对人民的全面专政和镇压。国家机器的权力无限扩张，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专政，资产阶级法权的不断扩展。最终，对生产关系变革的忽视带来了斯大林主义的失败和苏式社会主义的灭亡。

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那么党在这其中从革命者到压迫者的具体转变过程又是怎样的呢？因此我们进入第三个问题：包办替代主义。

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列宁的组织学说和革命理论。前面我已经介绍过了列宁的落后国家革命的理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在革命中组织和发动群众。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对于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需要一个组织来灌输，来培育，或者说无产阶级需要启蒙。那么就需要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把阶级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之中，组织引导无产阶级使他们去争取自己的权益。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观点。但是列宁没有论述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组织产生的问题。因为革命需要最广泛的发动群众，一两个人不可能成事，所以党不会傻到代替群众去革命。但是夺取政权以后就不一样了。党掌握了专政机器，还掌握了知识和技术。那么，在引导无产阶级继续前进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包办替代主义的倾向。

包办替代主义是比利时著名的左翼理论家厄内斯特·曼德尔在《权力与货币》中提出的概念。所谓包办替代主义，就是指一个阶级或阶层在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后，由于这个阶级或阶层的组织能力和阶级意识的不成熟，因此这个阶级在革命中的“先锋队”在革命胜利上台之后与这个阶级本身发生疏离和异化的现象。因此，这个“先锋队”不再试图继续去组织和启蒙本阶级使得它成为更有力的政治力量，相反，“先锋队”开始自作主张为它所自认为代表的那个阶级包办一切。而它所运用于包办替代的就是党组织对专政机器和暴力的掌握权，以及对技术知识的垄断权。与之对应的是，在革命时期可能相对比较有组织有纪律的阶级队伍在革命之后由于没有能够把这种组织模式制度化和常态化，结果导致丧失了组织性和参与性的民众对于公共生活的干预能力的丧失与“先锋队”蜕化成官僚集团利用包办替代主义为自身谋取私利。

因此，尽管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是最大限度的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的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阶级专政。”但是“党不仅没有像列宁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无产阶级群众（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反对官僚集团的武器，而且党自身反而成了官僚集团专政的工具。不仅没有使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上升为直接的统治阶级，而且党越来越蜕变为一个远离工人阶级的特殊的官僚机构。”包办替代主义的力量在革命成功后却利用手中的权力摧毁这种群众的组织形式，也就是在摧毁民主的可能。

在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的历史话语中，社会历史的方向往往不直接取决于阶级的经济实力的对比而是组织力量以及意识形态所能达到的动员能力是否强大。一般来说，左翼所代表的阶级力量都趋向于社会的偏底层，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活动中，由于底层阶级的经济实力、组织能力和斗争能力远远不如统治阶级，因此革命的成功，往往来自于一个规模较小，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先锋队”性质的左翼政治团体。作为“先锋队”他们发动群众，在革命时代由于斗争激烈底层阶级可以暂时地团结起来，在代表他们利益的左翼团体的指引下取得斗争的胜利。但是在胜利以后，由于这个左翼团体立场的变化，在社会结构尚未完全改变的情况下（这需要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作为基础）坐上了他们曾经所反对的人所坐的位子。如果在一个注定会导致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追求平等，那么必然倚赖的就是一个超出经济力量之

上的权威，即政治权威。由于革命成功以后底层阶级不再像革命时那样团结，从而出现分散的倾向，而左翼“先锋队”也不再趋向于组织发动和启蒙群众，让他们自己去消除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平等，而是自己运用政治权威去强行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平等，那么包办替代主义就会因此崛起。由于包办替代主义导致的政治权威的加强而不是减弱，国家机器的强化而不是缩小，离左翼所最终期望的“社会收回国家”的愿望越来越远，阶级代表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微弱，那么革命异化为新的剥削与压迫，甚至是新的恐怖，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以苏联为例，“不是计划的内在本质导致了苏联官僚制度的极大膨胀，而是官僚集团的权力决定了苏联及其类似社会的计划的特殊形式。”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